

晚明山人治生论

王燕燕^①

(兰州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兰州 730000)

摘要:“山人”一词由来已久,但其作为一个阶层出现并活跃是在晚明。作为被排除在仕途之外的知识流民,山人“不事产业”,“问舟车于四方”的世俗治生方式曾一度遭到非议,但其多样的治生方式无疑是晚明下层士人生存发展阻滞下出路的探索与扩展。其治生方式的多元性、流动性、世俗性客观上也为士人人格的完整与健全提供了契机与条件。

关键字:山人;晚明;治生

Discusses on the survival way of Shanren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WANG Yan-an

(History and Culture College of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00 China)

Abstract "Shenren" as a word has had a long history, but as a social class it emerged and was active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As refugees with knowledge who were excluded from the civil service system, they "did not take part in any production activity" and "were traveling everywhere for necessity". So their secular survival way had been criticized. But the variety of the survival ways represents the exploration and expansion of the lower class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whose survival way had been blocked. Their multiplicity, fluidity, secularity survival way also provided the opportunity and condi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complete and healthy personality.

Key words Shanren; the late Ming Dynasty; the survival way

“山人”一词由来已久,但其成为一个社会阶层并活跃是在晚明。谭元春载:“山人者,客之狭薄技,问舟车于四方之号也”。^[1]张建德称:“山人是以诗文书画为工具,干谒权贵,并不断流动以获得‘幕修’或赠与为主要目的的士人社会群体”。^[2]作为一个举业不成、四处流动的下层文人群,山人的生存方式不仅受到传统文化与观念的影响,也与晚明独特环境下下层士人的生存境遇密切相关。以下即从山人治生方式及其背后所反映的社会问题为出发点,对山人治生问题做一浅述。

“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当士人在谈及“生计”这一话题时,立场分明观点集中,然而面对具体的“谋生手段”,议论却显得匮乏无力。君子谋道不谋食的风范实际上是在禄利之途使然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脱离了这一大前提,“百无一用是书生”也就成了士人谋生困境的真实写照。作为出身贫寒而又被仕途排除在外的山人,其治生方式及背后的的心态颇值得玩味。

未能入仕的文人历来有之,而对于未仕后的生计问题,也并非自山人始才凸现出来。对于士人可持之业,史籍中不乏相关议论。宋人袁采在其家训《袁氏世范》中讲到:“其才质之美,能进进士者,上可以取科第致富贵,次可以开门授徒以受束脩之奉。其不能习进士业者,上可以事书礼,代签简之役;次可以习点读,为童蒙之师”。明遗民王夫之在总结

① 收稿日期: 2009-03-25

作者简介: 王燕燕,女,甘肃定西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明清史研究。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士人经验时,也曾谈及谋生手段:“能士者士,其次医,次则农工商贾各惟其力与其时”。^[3]对于晚明未仕的落魄士人,其治生方式可以有耕读、入馆、医卜,入幕几种;山人无恒产而又举业不成,其治生方式只能向传统靠拢。

山人是被排除在仕途之外的下层文人,其主要的构成是生员群体。明代学校体系开放,生员身份平民化,造成了山人无法更多地依靠家庭供给来维持生计,只能自谋出路。处馆是文人传统的职业,山人举业不成,初期的交游干谒也未开始,处馆成为当务的谋生选择。明代山人大多数早期都有过类似处馆的经历。如“周鼎,字伯器,客寓吴中,教授为业,正统末年,福建盗作,金尚书统兵往征,他以儒士自荐,愿效力军前,被允”;^[4]¹⁹⁵“沈如松,以《易》补博士子弟员,称高材生。然家故贫,罍粟数绝,不能衣食父母。稍稍以《易》授州里子弟,或馈之金……客游东吴,半以《易》授诸生。借诸生所遗一膳母”;^[5]“常熟陈霁峰,为博士子弟员,曾在上海韩氏、乔氏、杜氏家处馆。后归常熟,‘谢去诸生业,称山人’。”^[6]徐渭科考失败后也曾做塾师,陈继儒23岁馆于王升之,24岁时馆于姚与,26岁馆于王锡爵。处馆并不是山人治生方式的本质特征,也不是山人最后的选择。虽然,大多数山人有过处馆经历,但对于山人来说,处馆只是暂时的栖所,并不是其最后的归宿。明代塾师地位低落,收入微薄,师道尊严沦丧,“师道在今日贱甚,而束脩之入仍不足以供仰俯”,^[7]不仅是明代下层士人深刻的现实感受,也是明代士人群体性的共鸣。而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塾师的竞争却异常激烈,“富实之家才有延师之意,求托者已糜集其门”。^[8]塾师生存环境的恶化造成了明代山人以塾师为生的短暂性,也促使了山人不得不转向其它生计的拓展。

“游幕”是山人另一条重要的治生之道。明代边防甚重,史载“自隆庆以来,款市事成,西北驰备。犂下皆以诸边为外府,山人之外,一切医卜星相,奉荐涵出者,各满所望而归”。^[9]山人黄之璧“自负其才,旁无一人,宋西宁延为记室”;^[10]“山人胡思岩,屡次出入翁万达幕府。先同往交州,后至潮州,相助军事”。^[11]嘉靖年间,胡宗宪开赴江南平倭召士人入幕策划,大量山人进入幕中。徐渭于嘉靖三十七年入胡宗宪幕,王寅也是客督府尚书胡公所,但在幕中境遇却不及徐渭。何心隐,少补博士子弟员,胡宗宪稔知其才“以礼聘之,赞谋帷幄,以平倭寇”。^[12]嘉靖至万历年间士大夫投刺成风,交游也日益奢侈,大量

山人奔赴京师做了王公贵胄的权门清客。如谢榛于万历年间游赵康王幕,郑若庸于嘉靖三十年应召北上成为赵康王幕客。吕时臣一生为清客,早年客于齐、梁、燕诸王门下,继而客于章丘李伯华处,再客于青州衡庄王府中,晚客于沈宣王处,年七十客死于河南涉县。嘉靖皇帝好斋醮,喜青词,许多有名望的山人进入大学士府代拟青词,成为“相门山人”,如吴扩客于严嵩,沈明臣客于徐阶,王稚登客于袁炜,陆应阳客于申时行等。

晚明文人的好游,山人的干谒之游尤具特色。纵观明代山人,或多或少都曾有过游食公卿的经历,从最早的王佐“旅游京师,客公卿间三十年”,孙一元“游大人以成名”到后来的王寅、谢榛、郑若庸等,无不如此。与春秋战国的食客相比,山人似乎与其有着相似之处。但从流动性来讲,山人的流动性要远远甚于春秋战国的食客,若用“寄食”来论春秋战国食客的话,明代山人用“游食”来喻更为确切。对于仕途无望的山人,游幕不仅是其重要的谋生手段,对山人难以施展的经世抱负也算是一种弥补。

文化商业活动是山人治生的另一途径。明代商品经济发展,山人的卖文不仅继承了以往的形式,也吸收了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成就。卖文的范围不仅从诗文扩大到绘画、书法,规模也从以往单纯的文章书画,发展到更高层次的编撰出版,甚至商业经营。与以往不同的是,山人的商业文化活动是围绕着干谒游走。一些有实力的山人在交游中声望逐渐提高,他们不满于单纯的干谒卖文,转而从事经营出版的商业活动,如张凤翼、梅鼎祚、陈继儒、童佩等。史载,顾元庆藏书万卷,择善本刻之,署名阴山顾氏文房,鬻书于世。王稚登以买书画为生,声名远播,以至环先生而居者,借其名以鬻售,不至糊口四方。张凤翼在门外公开张榜标示各类诗文价格,“本宅缺少纸笔,凡有以扇求楷书满面者银一钱,行书八句者三分。特撰寿诗、寿文,每轴各若干,人争求之。自庚辰至今,三十年不改”。^[13]他不仅出版了《文选纂注》一书,还“与奴客游大江以北”推销。梅鼎祚也是以书籍的编纂出版为治生之路,他先后辑成《苑雅》《续苑雅》《汉魏诗乘》《八代诗乘》《唐乐苑》《文记》等三百余卷,并利用其交游干谒进行发行。陈继儒也是山人中书籍编纂出版经营的佼佼者,史载他“招吴越间穷儒老宿,隐约饥寒者,使之寻章摘句,部分族居,刺取其琐言僻事,荟撮成书,流传远迩。款启寡闻者,争购为枕中之秘”。^[4]⁶³⁷

文化商业活动是明代下层士人,尤其是山人谋

生的独到之处。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影响着商人地位的变动,也影响着士人阶层甚至整个社会文化观念的变化,而商品经济发展带来的一系列变动也为夹缝中的晚明山人提供了一条治生之道。此外,山人的干谒活动也是山人谋生的重要途径。山人的干谒一方面是为了提高名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直接的经济利益,王稚登在《答大鸿胪张公肖甫》中一针见血的指出“谒之道有二,上者流名誉,下者要货赂”。山人干谒求乞,免不了士行沦丧,这也是山人招致非议的一大原因。

二

对山人群体的评价,很难在以往士人的论述中找到肯定的内容。王世贞抨击山人:“山人不山,而时时尘间,何以称山人”;^[14]薛冈直斥山人:“身匪章缝,家起卑陋,难亲显贵,故盗美名,思溷衣冠以邀盼睐……未通章句,亦议风骚,诘其所学,茫无应声……一闻好客,百计求交,耽耽贵人,以为奇货,察其喜怒,委曲迎合”;并毫不掩饰地大骂“人有此类,殃大矣,山有此人,辱莫甚矣”。^[15]万历二十九年册封皇太子,诏书内有一款勒令尽逐在京山人,沈德符称其“大快人心”,并讥讽山人曲体奉承有“倚门断袖所不逮者”。四库馆臣谈及明清易代经验时称“隆、万以后,运趋末造,风气日偷,道学侈称卓老,务讲禅宗;山人竟述眉公,矫言幽尚”。^[16]

山人为世人所诟病,源于其“问舟车于四方”为谋食而非谋道。这无疑违反了一直以来“学不谋食”,“以治生为俗累”的士林风尚。而将“道”置至于“食”之后,以诗文为工具,更是违背长期以来社会对“士”这一角色的期望与认同,这也是山人一直以来受人诟病的原因。作为长期以来谋道不谋食,安贫乐道的士人来说,山人游走四方,乞食干谒的生活无疑是抛弃了士人对其道德品质的最后坚守,而以技艺糊口、行同商贾更是因贫失节,在士人心中无异于混淆流品、自甘堕落。明人对山人的评价讽刺也从侧面透露了,处于晚明独特环境下士人对其自身品质的努力坚守与维护,以及对士风下滑、士人地位下降这一现象的危机感与恐惧感。从这一点讲,对山人的痛斥无可挑剔,但如果抛开形而上的道德论,从山人实际面临的境况与形而下的生计问题来看,山人世俗的治生方式也是晚明独特环境下下层士人面对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与开拓,无可厚非。

“学不谋食”、“安贫乐道”,回顾中国传统士人

的异业治生,在论及生计这一敏感问题时,士人往往将“谋食”与“谋道”作对立观,并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有形而下的生计问题转化为义理道德的空谈,将生计问题抽象化。而士人在实际选择其生存方式时,也常常陷于“道”“食”的尴尬境地,难以取舍。面对生存环境的变化,经济关系的变动,“道”与“食”的矛盾就更为突出,而下层士人在治生问题上所承受的责任,也就不仅仅来源于生存的压力,更添加了一层道德上的不能承受之重。实际上,“道”与“食”这对矛盾一直存在于士的整部历史中,并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而晚明科举之路的拥塞、商品关系的发展无疑激化了这对矛盾。

山人是一个身处夹缝中的下层文人群,其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尤为突出。作为一个上下层流动的汇合点,社会任何缓慢的变动与震荡,其都是最先的感知者。1400年,6500万的人中约有3万生员,比例大约为1/2200,1700年1.5亿人中有50万生员,比例为1/300,而生员背后庞大的文人群更是难以估计,按张仲礼先生的计算方法,同期应试的读书人数目大致为生员数目的7倍。^[17]由此,我们不难想象明末那庞大的文人群体,进而想象到山人人数的庞大与其所面临的困境。

科举之路的狭窄,文人群体的激增,商品关系的变动,塾师竞争的愈演愈烈,田则尽归于富人,无可耕的现实。面对这些变动,长期以来抽象化义理化的治生言论明显无法解决晚明下层士人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在此情况下,夹缝中的山人首先冲破了以往“谋道”“谋食”尖锐对立的道德负担,拓展出一条新的生存之道,不得不说是一种突破。可以说,山人群体的产生以及治生方式的世俗化、商业化,是下层士人对其自身生计问题的一大思考与拓展。而山人群体的产生不仅是晚明独特环境下的产物,而且也从深层次指向了明代科举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危机,甚至更指向了士大夫群体长期以来知识、技能,尤其是面对社会环境变动时生存能力的巨大缺陷,这也是明代山人问题背后更值得思考的问题。

对山人生活方式的世俗化商品化,士人露出了对士风下滑的恐惧。而对于山人行同商贾,混淆流品,士人更是将它等同于因贫失节,自甘堕落。事实上,士人社会与下层社会长期脱节,对于混淆流品的恐惧无疑有士人高高在上姿态的作祟;而士风沦丧的责任,也并非一个山人群体就可以承担。正如屠隆闻“逐客令”后所说的一样:“今所贵制科,而布衣贱矣。内向朝士投刺,外为诸侯扫门,俯仰求一饱不

可得,何横之有?天下大矣,宁能从闭门待尽如袁安,逐客安归?殊非大体。且国家可忧者多,独二三布衣不能坏乃公事”。^[18]而俞允文在《赠王按察伯和序》一文中为山人的辩解也未尝不道出了山人治生困境的真相:“今方国之所专任而最重者唯正甲科,而征召绝不复行,其所以遗佚难以比数,往往至于齿庖发秀,偃蹇掘堞之下,罕寄一命以虑所长。故士有一隙可以薪通,将无弗为者,此岂士之过哉!”

作为被排除在仕途之外的知识流民,山人“不事产业”“问舟车于四方”的世俗治生方式曾一度遭到非议,但其多样的治生方式无疑是晚明下层士人生存发展阻滞下出路的探索与扩展。其治生方式的多元性、流动性、世俗性客观上也为士人人格的完整与健全提供了契机与条件。而在对山人治生方式的各色评价中,我们也可以对晚明独特环境下下层士人所处的生存境遇略窥一斑。

参考文献:

- [1] 谭元春. 谭元春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789
- [2] 张建德. 明代山人文学研究[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5 24
- [3] 王夫之. 船山全书[M]. 岳麓书社, 1991 642
- [4] 钱谦益. 列朝诗集小传[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 [5] 茅坤. 茅坤集上[M].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3 592-593
- [6] 陈所蕴. 竹素堂稿[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集部第172册.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 642
- [7] 戴名世. 戴名世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83
- [8] 顾元起. 客座赘语[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96
- [9] 沈德符. 万历野获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434
- [10] 周晖. 金陵琐事[M]. 明万历三十八年刊本, 上海: 中央书店, 1935 626
- [11] 翁万达. 翁万达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39-41
- [12] 邹元标. 何心隐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120-121
- [13] 沈瓚. 近事从残[M]. 北京: 广业书局, 1928 29
- [14] 王世贞. 弇州续稿[M].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3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5 96
- [15] 卫泳. 冰雪携下[M]. 上海: 中央书店, 1935 56-60
- [16] 永瑢, 等. 文渊阁四库全书[Z].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1124
- [17] 纪莺莺. 明清科举制的社会整合功能[J]. 明清史, 2007 (2): 10-11
- [18] 屠龙. 鸿苞·要言[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89册. 济南: 齐鲁书社, 1995 12

责任编辑: 骆晓会